经济研究

对清代经济的一些看法

方 行

清代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。对清代经济拟分前后两个时期分别作点评述。

一、清代前期的经济

清代前期的经济，特别是清代十八世纪的经济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。

清代前期，粮食总产量、重要产粮区的亩产量，以及经济作物的发展，都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。城乡手工业出现了家庭劳动向雇佣劳动转化，个体小生产向手工作坊、工场手工业大生产发展的明显趋势。发展了一批雇工多到数百人，少到数十人、几个人规模不等的商人雇主制手工作坊和工场手工业，创建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。

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服务业，如茶楼、酒馆、戏院、旅舍等都有大发展的同时，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，如商业、航运、金融等也蓬勃发展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商业发展首推贩运贸易，它超越了传统商业以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供应城市消费者为主的格局，发展了生产者之间的交换，特别是粮食作物区、经济作物区、手工业品产区农民与农民、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。如四川、湖南米谷与江南棉花、棉布的交换，东北大豆、豆饼、小麦与江南棉布与茶叶的交换。这是贩运贸易开拓国内市场的一种突破。航运业的发展，可从航运路线的开辟得到印证。鸦片战争前，内河航运的东西干线，南北水陆联运干线，以及南北洋沿海海运干线，都已具有近代规模，鸦片战争后不过是轮船代替木帆船而已。金融业中，传统典当大量发展，钱庄、票号不断兴起。明代钱店主要从事银钱兑换业务，乾隆间，存款、放款和汇兑等信用业务，在钱庄、票号中相继展开，它们的汇票、银票、钱票等已在南北各地普遍流行。钱庄、票号信用制度的趋向完备，说明他们已具有现代银行的基本职能。

清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并没有重大改进，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也没有实质性变革。其发展原因何在？值得探讨。西方经济学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，对此具有参考价值。

一个国家如果能按照其要素禀赋——资本、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所决定的比较优势，来选择产业，其经济就会有自生能力，就能得到较快发展。清代人口大量增加，劳动资源具有数量多、素质好、工价便宜的巨大优势。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，它引导资本和大量劳动力进入产值高、利润厚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，使劳动、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得到了比较优化的配置，从而促进了包括第一产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得到发展。

分工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，清代前期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相互需求，连锁互动的发展，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分

［收稿日期］2008－5－10
［作者简介］方行（1926—），男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；北京 100836

工发展的反映。恩格斯提出奴隶社会有三次社会大分工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就是商人的发展。可以说清代第三产业的发展，正是三次社会大分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继续推进。长距离贩运贸易和突破区域性限制的大市场和运输条件，对近代工业尤为重要。这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走向全面走向成熟的表现，也就为中国近代化准备了一定的条件。

二、清代后期的经济

自秦汉以来，历代王朝的经济都经历了一个由繁盛到衰败，直至灭亡的历史周期。其衰亡的主要原因有奢靡腐败、农民起义、外族入侵等等。从表面上看来，清代这些因素都有，与历代王朝有几分相似。但是时代不同了，历史不再简单地重复。

当时，资本主义列强兴起，后来是帝国主义列强兴起。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。这种经济全球化，实际是资本主义全球化，正如马克思所说，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。它们用武力掠夺别国财富，抢占殖民地。中国也被卷入这个历史潮流之中。它们凭借不平等条约，获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，用赔款、设厂、开矿、筑铁路、办航运和进行不平等贸易，大肆掠夺，导致中国民穷财尽，沦为半殖民地。这是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社会沉沦。

但是，它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经济变化。数千年来，中国主要是利用一种资源、一个市场，即国内资源与国内市场来发展经济。鸦片战争后，加强了与外国、特别是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，转变为可以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，即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来发展经济。这就扩大了中国经济的活动空间与回旋余地，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，也会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。

比如手工业，除少数行业，如土钉、土针、土钢等被外国机械产品所淘汰之外，大多数手工行业随着国内需求的扩大，和外贸出口的增加，大都有所发展。有些手工业企业还采用机器设备向近代化发展。有的学者认为，清后期手工业的发展，“是近代化过程中一个必经阶段”。清前期的手工业“始终没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”，“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补课”。（汪敬虞、吴承明）

又如经济作物，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，经济作物有所发展，特别是通商口岸附近地区和铁路沿线地区发展得更快一些。有的学者说，由于农产品及其制成品“输出的急剧增长，经济作物种植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”。（严中平）

商品生产发展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。上述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发展，正是利用两个市场所获得的功效。尽管在这种进出口贸易中，国际资本和买办资本得大头，中国商人得小头，最后吃亏的还是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经济发展。并也同时说明，当时的经济困窘，主要不是生产问题。

在洋务运动中，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，创办了军用的和民用的近代企业。这在古老中国是破天荒的大事。但它始终停留在引进先进生产工具的物质层面，并限制民间近代企业的自由发展。直到戊戌维新，才触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的制度改革层面。但它却被顽固愚昧的统治者扼杀了。在它所开风气之下，爱国工商业者却掀起投资热潮，取得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。不论它迈出的步子多么微小，总是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。如果没有西方国家提供这种稀缺资源，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。

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的开拓，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机遇。但却遇到了两股巨大的阻力。首先是资本主义、帝国主义列强，它们凭借种种政治经济特权，保证它们在开办厂矿、交通运输、进出口贸易等经济事业中，掌控着财富分配权，可以大肆搜刮，使清政府财政枯竭，人民贫困，导致资本要素严重匮乏。它们既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，更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。

其次是愚昧、顽固的封建统治者，既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挑战，也无力抓住这种有利发

（下转第 43 页）

相比,也增加了2.19倍。但这仅仅是名义数量,清代中国还没有全国统一的物价指数,如果用当时的主要商品米价进行替代,那么清末1901－1910年间的物价比1851－1860间上涨了2.28倍,比1781－1790年间则上涨了2.42倍。同时,我们还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,一方面清末时期15亿两的货币数量是就存量而言的,其中有一部分金属货币被收藏或用作储备金,并不参与流通;另一方面,晚清时期货币种类的增加和混乱造成了交易费用的增加,货币运行效率降低。因此,按照经济中的实际货币流通量,清末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规模确实比19世纪中期获得了一定的改善,但大概仍然低于清代中期(乾隆后期)的发展水平。

㊷代表著作参见方行、经君健、魏金玉主编:《中国经济通史·清代经济卷》,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。

㊸吴承明:《中国的现代化:市场与社会》,第229页。

㊹彭泽益: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》,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26页。

㊺参见吴承明:《中国的现代化:市场与社会》,第232－234、279、281、284、286－287页。

㊻参见彭信威:《中国货币史》,第707、710页。彭信威按照日本与西方学者的研究,得出自万历二十九年(1601)到永历元年(1647)的46年间,从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752万两;隆庆五年(1571)到明末的70多年间,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4000多万两,南洋与朝鲜等地区与国家也有一定量的白银流入中国。

㊼彭信威:《中国货币史》,第855页。

㊽Man－houng Lin,"Opium: the Culprit? －A Reexamination of China's Silver Outflow, 1814－50",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quantitative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— China'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, CCER, Peking University, June,2004。

㊾刘建生等:《晋商研究》(第二版),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,第320－323页。

㊿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二五七,"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庚寅"。

(71)汪喜孙:《姚司马德政图叙》,《从政录》卷二。

(72)参见光绪《两淮盐法志》卷一五七,"杂记门"。

(73)吴承明:《中国的现代化:市场与社会》,第165－166页。

(74)方行、经君健、魏金玉主编:《中国经济通史·清代经济卷》,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,第18页。

(75)冯桂芬:《显志堂稿》卷九。

(76)参见许毅等:《清代外债史论》,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,116－119页。

(77)杨端六:《清代货币金融史稿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,第208页。

(78)《皇朝政典类纂》卷六十四,钱币七,页十五—十六。

(79)马士: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第1卷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版,第232－233页。

(80)参见《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》第1辑,第96－99页。

(81)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》第1册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,第37页。

(82)《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》第1辑,第27－28页。

(83)魏源:《圣武记》卷十一,页八,中华书局1984年版。

(84)冯桂芬:《用钱不废银议》,《显志堂稿》卷十一,页三十三至三十四。

(85)包世臣:《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》,载《安吴四种》卷二十六,页三十七。

(上接第13页)

展经济的机遇。甲午战争后，虽然也制定过一些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，但却始终热衷于聚敛和借外债以筹饷练兵，巩固皇权，消弭革命，使民穷财尽的经济更雪上加霜，发展经济的政策大都成为一纸具文。

总之，清代后期既有社会沉沦，也有社会进步。二者是矛盾的对立统一，并非绝对相互排斥。尽管社会沉沦居于主导的一面，但社会进步也是不能否定的。从它灭亡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，而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，这就是社会有所进步的一种反映。

清代的灭亡，同时也是历时两千多年、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经济和文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。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，不宜简单化地加以论述。应当在历史大视野之下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充分论证它的历史必然性。